



现场

去一趟现场，
看老新闻老评论，
尝一尝“原味民国”。

总统并非皇帝

邵飘萍 / 著
石艳艳 / 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总统并非皇帝

邵飘萍／著
石艳艳／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总统并非皇帝/邵飘萍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可以触摸的民国)

ISBN 978 - 7 - 224 - 10364 - 9

I. 总… II. ①邵… III. ①中国历史 - 民国 IV. ①K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8770 号

总统并非皇帝

作 者 邵飘萍

主 编 石钟扬

编 者 石艳艳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23.5 印张 34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364 - 9

定 价 48.00 元

民国相关选题的出版，曾经是敏感的。那一度被僵化思维固锁住的，是太多面目模糊的身影。他们长袍马褂、旗袍绣履，那光影婆娑的身姿，一旦跃入脑际，就难再轻易离去。这也是近年来不管是影视还是图书，都出现了一股民国热的因缘。

有关民国的话题，似乎隐藏着一种魔力。那种潜游在净空深处的味道，从历史的不远处，静静地向我们移来。我们无法抵抗这种黑白质感的诱惑。然而，太多的民国是演绎的产品、是虚构的华章，民国真实的样子不应仅仅从名人、类名人的塑造中诞出，不应仅仅在华丽炫耀的镜头感里展示。民国绝不是“万恶的旧世界”，也不是“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她是我们的先人曾经在纠结中不断尝试和追索的第一次现代，是灿若星辰的文化人第一次放胆展示自我。同时，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保守与开放的争夺，西学与中学的通融，专制与民权的恶斗，极度的聪明和极度的愚蠢，极度的崇高和极度的可笑，都在这个时代充分表演，并给后人埋下了种子。所以我们的关注，不只是行注目礼，更是寻求还原，寻求真实，不管热血与极端，也不管沉郁与凉薄，这既是叙述对象的真实，也是原作者的真实。

《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丛书，我们计划分成几个子系列构建，目前即将出版的有：《可以触摸的民国·现场》《可以触摸的民国·侧影》《可以触摸的民国·细看》以及《可以触摸的民国·新学》。

《现场》板块，由南京财经大学的石钟扬教授执行主编，首选了四本：“报界奇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的新闻文选；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铁肩辣手”的杰出记者邵飘萍的新闻文选；“思想界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所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五四三圣”之一、“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的时评选。这四位报人（无论专职或兼职的）都是学者型的，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饱经磨难，透过这些依旧在燃烧的文字，可以触摸到他们滚烫的热血。

《侧影》板块，由我们编辑部操刀策划，编选民国著名学者、文人的文字，希冀觅得特殊视角，给读者一个陌生化的全新印象。譬如，傅斯年不仅是儒雅严谨的学者，我们编选的《现实政治》更展示出他对时事的敏感与睿智；徐志摩的《再来跑一趟野马》，集

其相关政论问题的文章，发现一个敏感政治、关心国家的徐志摩；朱自清的《人话》，选取他回忆性的散文篇目，串联起他的一生，搭建出朱自清的“忆之路”。

《细看》板块，则是结构别致的人物传记类原创性文本。回避宏大叙事的框架限制，省略过渡、延续的平淡，截取他（她）人生的一个个断面，或熠熠生辉，或苦痛难当，从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出发，去触摸他们灵魂深处的颤抖，如《萧红的100个细节》《郭沫若的30个细节》等。

《新学》板块，作者皆为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对民国的态度有其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创新，如《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选取这样被反复述说的特殊年份，却回避了政治，只看那剧变之下惶惑迟缓而跃跃欲试的百姓生活，对当下社会现状亦不乏启迪。

因为民国版图书的出版年代所限，文字中不少具体的用法，比如其中《人话》一篇中“您少爷在那儿上学？”的“那儿”、《春晖的一月》一篇中“我最爱桥上的阑干”的“阑干”，又或者《买书》一篇中“不知那儿检来《文心雕龙》的名字”的“检”字等，在现在的汉语环境中已经有了不同的用法，但为了尊重民国时代的真实性，以及作者自主创作的主权性，我们没有进行任何擅改。脚注部分属选本中自有的，我们尊重并保留。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编辑也针对具体的、可能有助读者理解的部分，增添了一部分注解。

作为编者，请允许我们向胡适、朱自清、徐志摩、傅斯年们致意。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文字上感知陌生而久违的率真、趣味和正直，倾听他们告诉我们知识人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生活，怎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形而上的问题。无论侧影，还是正面，在煌煌民国的文化殿堂前，我们都该收敛起自己虚张的声势，勇于正视那逼人的光焰。我们撩拨出的民国文字中的独特味道，是想与读者分享先生们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请惠存我们的好意，同时宽恕我们的浅识。

民国何在

总序
石钟扬

民国何似？

删繁就简，用几句耳熟能详的俗语或可尽其意。一曰“多事之秋”，文争武斗，各路英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二曰“内忧外患”，外患最大莫过日寇入侵；内忧先是南北对峙，继而国共内战。三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张之洞说晚清的话，移说民国更确。1912年10月10日民国成立，宣告在中国延绵数千年帝制的终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然而民主共和的理念与制度，在那充满着“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几乎从来没有实质性地实施过，更不用说到1949年民国从名到实都在大陆上消亡了。

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开篇一声惊呼，几乎成了贯穿民国始终的关键词：

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

从1912年到1949年，对于民主共和，有人惶恐，有人摧残，有人盗名欺世，也确实有人为之呼唤、为之解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百川归海，风云际会，于是有了民国景观、民国气质乃至民国精神。评头论足，民国人与前清人，一眼即可分辨，当陈独秀、鲁迅们一挥剪剪掉脑后的辫子就告别了前清，那乍看“像茶壶盖样”的发型就是民初男人的风貌；女人裹了多少年的小脚放开虽恢复不了天足，但这“半大脚”毕竟有别于前清的三寸金莲。这就是民国。这是全体国民的民国，非某党某派的民国。

民国也有过感天动地的精彩。文的莫过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她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且不说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仅文白之争就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书写传统，明白无误地把中国人带到了现代化的思维空间。武的莫过于八年抗战而至胜利，使蒙羞百年的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共论世界大事。

民国而今安在？

抚摩着从旧书店淘来的《民国丛书》、《新文学大系》，翻阅着《图说民国》的老照片，寻觅着老北大老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故事，抖动着久挂橱柜里的中山装，听听中山路上有百年树龄的梧桐在西风中窃窃私语，登临在夕照下仍然巍峨的中山陵……那民国的趣味、民国的习俗、民国的风尚……演绎成的所谓“民国范儿”，还若隐若现在我们生活中。民国百年生日临近，逼着或诱着人们问苍茫大地：民国离我们到底有多远？透过“民国范儿”遗存，仿佛还依稀见到民国那饱经沧桑的背影。

子曰温故而知新。人类总是要不断从历史中去吸取打造当下迈向未来的智慧与动力。何况民国毕竟不是遥远的历史，它当初剪下“尾巴”散落的毛发可能还在我们客厅的某个角落呢。

这些年人们似乎已经听厌了那些被粉饰或被肢解了的帝王将相的故事，于是民国故事渐渐成了热门话题，从而有了大量的关于民国的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包括影视）。该如何评价这种文化现象，或说当代写民国的书呈何境界？恕我孤陋寡闻，不敢置喙。偶闻有云，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文学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余都是真的。乍闻不免惊讶，转思觉得此说未免太高看文学而低看史学了。好在其似乎并非专说有关民国文史的。历史是追忆中的民国，文学是想象中的民国，由此走近民国本无可厚非。而我们突发奇想，能否寻找一条非文非史的途径去看民国，以避

高明之讥。民国有大量的民办传媒，“花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他们为道义与良知而写作，真正成为“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者”。他们对民国大小事情的现场报道（新闻）与现场评论（时评），堪称民间版的“民国实录”（历朝实录都是官方的），这本是民国难得的一道文化风景线。生活之树长青，生活有时比文学更好玩，来自生活第一线的报道自然也是如此。这些“民国实录”还未来得及加工成史著，也还没有被制作成文学，将之选编出来，或许能让人们一睹民国真容——一个原汁原味的民国。

民国报刊浩如烟海，民国报人才济济。我们这套“民国现场”丛书首选了四本。第一是“报界奇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黄远生（1885—1915）的新闻文选；第二是中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先驱——具“铁肩辣手”之称的杰出记者邵飘萍（1886—1926）的新闻文选；第三是“思想界明星”——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陈独秀（1879—1942）所主编《新青年》、《每周评论》中的新闻与时评选集；第四是五四“三圣”之一——“再造文明”的设计师胡适（1891—1962）的时评选集。

这四位报人（无论专职或兼职的）都是学者型的。黄远生十九岁即考中进士，邵飘萍十四岁、陈独秀十七岁即秀才及第，胡适更有神童之称，他们都有留学或域外工作的背景，旧学新知兼备。又都有“铁肩担道义”的担当，更不乏“辣手著文章”（明人杨椒山原句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易“妙”为“辣”，更见风采）的身手。他们“纪述则须眉毕现，评议则山岳为摧”。人称“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讯放一异彩”，甚至认为“不看过他的通讯，就不配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动态”（曹聚仁语）。冯玉祥将军则曰“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还说他“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充当“终身的反对派”，其以“天下第一刊”《新青年》和专为议政的《每周评论》，传播“救时的圣药”——科学、民主，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至今仍与时俱增。胡适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作政府的诤友还是诤臣，他都在为制度文明的再造作不懈的努力。胡适主张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包医百病”的抽象主义，针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如何当校长、党魁，如何当总理、总统，都有过设计，以谋求一点一滴的进步。

这四本书的主旋律是从不同角度追寻：共和在哪里？民主在哪里？而用科学启迪民众的愚昧，用民主抨击当局的专制，在陈独秀与胡适那里则

来得更自觉些、更理性些；他们鼓吹以法治国，于是呼唤“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政？”他们主张将人权置于一切政治权力之上，于是宣称“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无论是黄远生、邵飘萍，还是陈独秀、胡适，都曾为民主、为言论自由历尽艰辛，饱经磨难。黄远生、邵飘萍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生命，黄被刺杀时仅三十岁，邵被枪杀时也才刚刚四十岁。这些人类的良心，真可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四本书，有三本是从作者（黄、邵、胡）已有的文集或全集中选出的。其中《远生遗著》无新式标点，需要重新标点，颇为费事。（掩卷之余，不免感慨，不知那些治中国新闻史的教授们都忙什么去了，远生死去快百年了，他的文集还是素面朝天，无人整理。）《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那本则是从原刊中捞出来的。为此，让四位少帅忙乎了整整一个暑假，每本书都是汗水泡出来的。若读者欢喜，我们的辛苦就值。

2011年8月31日于南京秦淮河畔

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邵飘萍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是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壮烈牺牲的报界先驱之一。邵飘萍的民国现场报道，当年是为天地立心，为万民代言，讨伐专制，呼唤民主，启迪众生；今天看则不啻一部“活着”的民国编年史，字里行间仍然闪烁着智慧之光，昭示我们抚今追昔，倾心倾力铸造当今，迈向未来。

1886年10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名振青，飘萍乃笔名）出生于浙江东阳大联镇紫溪村。因为生辰八字奇特，身为晚清秀才的父亲邵桂林对他有了“三戌冲辰祸不浅”的预感。家境贫寒，身为秀才的父亲，为了三世同堂八口之家的生计，先是典女，

后是迁家金华。饱经漂泊之苦的邵飘萍少即聪颖，14岁即考上秀才，名震乡里。1906年（中国科举制度废除的第二年）当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时，一笔不菲的学费还是难住了老秀才邵桂林。好在朋友的馈赠，邵飘萍才走出金华，走向人文胜地——杭州，从而走向东京，走向北京，走向报界……邵飘萍诞生和成长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毫无悬念地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大门。风雨飘摇中的末代皇朝，无奈地任由列强肆意地夺取大量财富和无耻地炫耀血腥暴行，中国的老百姓则生活在最耻辱最惨烈的状态之中。敏捷的才思、独特的个性、艰辛的生活、苦难的时代，造就了邵飘萍勤奋的学习习惯、倔犟的性情品质、强烈的家国理念。还是一名在校学生时，就已显露出他日后“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素质和才能。受金华好友张恭创办《萃新报》的启发，邵飘萍与同学陈布雷在“新闻救国”理念的感召下，创办《一日报》，还模仿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为《申报》写地方通讯，为他日后专门从事新闻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个性中“任侠”的方面也逐渐表现出来，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辛辣的文字差点儿让自己被校方开除。他还和《中国女报》的创办者、名噪一时的女侠秋瑾建立通信联系，并在随笔中表达了因其壮烈牺牲而愤懑不已的心情。1911年，受老报人杭辛斋的邀请，毕业后回到家乡任国文教师的邵飘萍再返杭州，成为《汉民日报》主笔，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新闻事业中去。从此邵飘萍就像是开足了马达的机器一样努力地在新闻战线工作着。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新闻记者”；首创编译社；创办《京报》，成为中国的早期职业办报人；建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编写理论书籍，揭开了中国新闻学教育与研究的序幕。1919年5月3日，他在北大学生大会上登高一呼，报道巴黎和会的信息，号召大家为救亡图存而奋起，诱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他曾说：“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从1911年到1926年，短短15年的时间，因讽刺袁世凯和揭露曹汝霖，两度流亡，三次入狱。但“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只要条件允许，邵飘萍的时评与通讯如同雨后春笋，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数量惊人，且对事实鞭辟入里，读来叫人痛快万分，令当局胆寒。1929年，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邵飘萍于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调查采访事件真相，连夜写出讨段檄文《世界空前惨案》。

惨案发生后 12 天内，邵主持的《京报》为之发文 113 篇，其副刊为之发文 103 篇。同时《京报》还印发特刊 50 万张，唤醒民众奋起讨贼，北京当局被搅得心惊胆寒。冯玉祥将军称道的“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绝非虚言。因而反动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奉系军阀张作霖大打出手，先是散发传单，诬邵为“卢布党”，继而监听邵的电话，监视他的住所。在邵避难期间又悬赏诱捕、派兵缉捕，终于 4 月 24 日逮捕邵飘萍。4 月 26 日凌晨，将邵“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这年，邵飘萍刚到“不惑之年”。

念兹在兹。斯人早已远去，但他所留下的大量时评、通讯和专论，至今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本次选文的落脚点在于“现场报道”四字。当代信息图像技术的综合高效发展为从业人员提供了较多的方式和较好的平台，“现场报道”做起来相对比较轻松。可是在邵飘萍所处的时代，因缺乏上述手段，“现场报道”除了对于记者的访问能力要求较高外，还需要撰稿人的生花妙笔与对时政的敏感：追踪线索、捕捉信息、传送文字，环环相扣，一个报人的能力要和今日的一个报道小组相仿，这些恰恰是邵飘萍的长处和优势。1911 年到 1926 年，历史的发展没有让封建王朝和专制政府逃过注定的轨迹。辛亥革命就像是一声惊雷，让末代王朝的幻想彻底化为乌有。但彼时新政府的成立又注定带有几分悲剧色彩，袁世凯复辟，窃取孙中山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果实。袁氏皇帝梦未醒，又跌落在红尘乱世之中。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黎元洪、段祺瑞、张勋、张作霖、冯玉祥等一千人各怀心思，上演着一出出绝世好戏。国外势力也不甘落后，纷纷插手其间。于是，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南北内战前后相继，《二十一条》中日借款、罢工浪潮、血腥镇压纷至沓来。在这样的背景下，邵飘萍就像一位骨鲠在喉的史官，立志“尽自己的天职”、“平社会之不平”。他不仅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而且毫无顾忌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在阅读邵飘萍的时评通讯时，就仿佛在收看时下流行的时事评论秀，忽悲忽喜、欲哭欲笑、又苦又甜。有人认为，其实邵氏从事新闻记者的职业，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希望以此入政，只因去世过早，未能达成。以文来勘，邵飘萍对于政治的敏感程度实非一般人等，若果入政，也许能成就一番，不过，就性格来说，终是一场悲剧。但也因此使他的新闻稿件更具有观摩和玩味的价值。本次选文尽量结合历史大事件，选择邵氏笔下具有情节化的报道，同时也兼备一定的现实意味。历史虽不可复制，但后人在品

味时总会产生些许感悟和启迪，就是所谓的“前车之鉴”吧。多少不论，总归是“善莫大焉”啊。

邵飘萍的文章充分体现着具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品性，对事实的叙述与评价往往客观深刻。独立之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种先天的禀赋，但也需后天的锻造。邵飘萍的个性独立，多少受到家庭环境和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也离不开自身品性的作用。他曾在自己的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撰文强调“品性为第一要素”。当众多报纸都因接受军阀或外来势力的资助并不得不得其左右时，邵飘萍迫于报馆的生存和自己生活的需要也得到过一些赠与，但办报方针却从不为此动摇，尽管被时人诟病，却使他能够在15年的记者生涯中始终保持乱世中弥足珍贵的个人色彩和独立精神，造就了他好针砭时弊，陈述客观公正，评价尖锐且直指要害的新闻报道风格。袁世凯图谋窃取大总统位之初，世人大多混沌无警醒，邵飘萍却在时评中愤怒地表示“孙总统有辞去总统之权，无以总统让与他人之权。袁世凯可要求孙总统辞职，不能要求以总统与己”，一针见血地揭露出临时政府“欲保目前之和平”而采取“即授总统于袁以了事”的方式，本质上不过“是总统为皇帝之变名”。在指摘国父孙中山的严重错误时，也让袁世凯的阴险企图成为司马昭之心。更可贵的是，面对袁氏的利诱和威胁，邵飘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刚直的性格，丝毫不为所动，继续用自己犀利的文字不断向大众介绍和分析事件的发展态势。若以今日某些流行的价值观来判断，邵飘萍的此种言行貌似甚不合时宜。但恰恰因为这满腹“不合时宜”，他所留下的文字才具有真正意味的历史客观性。那些被某种思想或主义垄断的文字或许读来更加激动人心，却不能给我们冷静地指出现实的误区。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邵飘萍对于民主的期盼是强烈的，对于新国家的建设是充满热情的，但他坚持原则，认为这种热情不能以迷信某一领袖为代价。新国家、新政府、新领袖，对于1911年后的中国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邵飘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在文章中提出这种警告，实在是非常罕见。只可惜彼时报人的地位实在低下，而时局混乱不堪，舆论只能由利益把持，邵的怒吼也只能淹没在历史的河流中。

作为民国时期的报界从业者，能够在报纸文章中宣扬民主平等的观念，并将之落实到新闻报道内容题材中，造成广泛影响的人不算多。特别是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受到国内封建残余势力和军阀、国外列强的多重压力，践行不易，亟须舆论的大力鼓吹。生于艰难困

苦之中的邵飘萍，自小受父亲熏陶，对于国家之强盛、百姓之安居这一美好图景有着急切实现的渴望，自然而然地成为报界宣扬民主和平等的旗手。因此除袁世凯复辟事件中的言论，在二次革命、府院斗争和南北内战中，邵飘萍也曾有诸多相关议论。但是邵飘萍反对以武力解决一切问题，认为“夫果武力而可以解决时局，以武力解决时局而果为国家万世之利，则吾人即出重大之牺牲亦不敢辞其苦”。表面看来，邵的言论有些骑墙派的意思。其实这种反战并非一味懦弱，而是从民情和外交两方面考虑其恶劣影响：“民国成立，元气未复，忽焉而有二次革命之大举。浔阳宣战矣，徐州宣战矣，沪渎宣战矣，孰为救民水火？孰为涂炭生灵？”“傀儡之决斗愈烈，国家之糜烂愈深，而在他国则愈为有利。”邵飘萍从民主观念进而有了早期的民生思想，无论大事小情都能真正为民众考虑，为底层百姓的生活而谋划。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报界壮士，他的勇气和智慧，他的果敢和细腻，不仅使《京报》赢得了政治界的重视，也吸引了普通百姓，造成社会反响和报纸销量的双赢效果。

那个时代里中国多数记者的地位完全不似今日，他们常常为人所鄙夷和轻视。但邵飘萍却改变了这一风气，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分析当时社会不欢迎访员（记者）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新闻事业在当时的地位不高，二是由于访员的素质不高。对于前者，邵飘萍在大学里倡导学科建设得以改善；对于后者，邵飘萍除了举办学习班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他的文章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感，也可以看到他高超的采访技巧和报道方式。一个合格的记者，除了独立的人品，也要注意自己的服饰装扮和言行举止。邵飘萍对于自己的内在和外表都有极高要求，他花费巨资购置华服，还买了一辆当时不多见的轿车供采访专用，因此有时被人诟病，其实现在看来，这不过是时下流行的公关和包装技巧。邵飘萍以时政报道为主，庄重高雅的服装配饰为他能够自如地出入于政府机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也打开了诸多本来艰难的访问局面。他谈吐儒雅得体，使得“恶见新闻记者”的“北京大官”也“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他常常采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又因为敏感性极强，“数语已得要领”。报道中口气恰当，“其有于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邵飘萍为了新闻线索往往彻夜不寐，他曾向爱人祝文秀抱怨“真正苦死了”，骨子里却乐此不疲。如府院之争中段祺瑞被黎元洪驱逐下野后重新回京任职时，其他媒体没有任何相关信息，邵飘萍首先发现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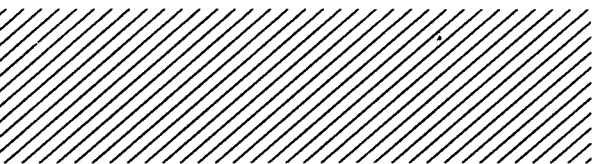
的蛛丝马迹并机智大胆地买通门卫进入段府并为之通报。当众人以为肯定无功而返时，未曾想到二次上台的段祺瑞此时正有向外炫耀的心理，不仅没有发火驱赶，而是得意地答应了采访，更在采访过程中就当前局势侃侃而谈。采访顺利结束后，邵飘萍立即返回报馆将之记录刊发。整个流程实在有如精彩至极的大片，令人拍案叫绝。

情与理如何调和，常常令新闻报道者深感困惑，其实，万物皆以情理为因，至情则至理。读邵飘萍的新闻通讯，除了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令人印象深刻之外，他的一腔热血激情也令人久久难忘。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他为新纪元的开创激情澎湃；国内军阀混战，他为百姓的痛苦而焦灼万分；外国列强巧取豪夺，他为民族兴亡长吁短叹。情感起伏鲜明可见，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国家和民族深入骨髓的爱。有人认为和黄远生相比，邵飘萍的文笔要略逊一筹，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这一时期新闻从业人员的杰出代表。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源自于“铁肩辣手”的担当，也来自于“鹿死不择音”的自励。而其语言叙述和思想表达的能力相较于同时期的记者来说，也并不逊色。他的文章常常情不自禁地通过轻松自然的景物描绘来烘托新闻事件的紧张气氛，两种色彩相映成趣，互相交融，颇有些虚实相生、欲扬先抑的手法。这或许是受到早期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学习经历的影响吧，但读后确实叫人难以忘怀。例如为后人所看重的“中央通信”第八十一篇中，作者开头用清丽舒缓的语言描写北京总统所居之地：“当此杨柳依依，莺声婉转，市尘不到，清风徐来，一履其地，便令人愁虑俱消也”，让读者浑然有出世之感。下面则笔锋一转：“谁知半月以来，政海浪涛起于仅十字之命令。遂使鼙鼓惊天，烽烟满地，四郊多垒，万姓咨嗟，兄弟各蓄其戈铤，甥舅斗于原野，此如何景象也哉”，将出尘之心瞬间抖入凡尘。这一段音调谐美，前后相应，更是反衬出了府院之争带来的恶劣影响。

邵飘萍的新闻报道中可见出其广博的知识和对万物的关怀。邵飘萍的新闻报道包罗万象，并不拘泥于某一素材或形态。他的报道篇幅或长或短，或多或少，但都联系实际。有关于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部分，也有关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部分，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各个层面，可谓大事小情绝无遗漏。更重要的是他的分析和论述在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同时也不失学理性，这当是基于邵飘萍深厚的历练和勤奋的学习。一个有抱负且能取得成就的新闻人不正该当如此吗？近年来有学者

特别加强了对于邵飘萍新闻报道中法理精神的研究，比如轰动一时的罗文干案，确实透露着邵氏浓厚的法学精神和普世观念，值得探讨。毕业于牛津大学、履历光鲜的罗文干，曾在解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22年被吴佩孚笼络进由其操纵的“好人政府”，因为对外借款一事中得罪了中外相关势力而于年底被逮捕入狱，期间经历两次出狱、入狱，共计一年多的时间才获得自由。在这一案件中，邵飘萍特别撰文公开为其被诬一事鸣不平，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除了法律意识外，大约也因为自己有过相似的遭遇吧。只可惜，罗文干最后洗刷了清白，重返政坛，而邵飘萍却因为犀利的言辞终于于刽子手刀下。

大漠苍烟，紫溪地灵。故人已然远去，但愿我们在寻摘历史留存的文字的过程中能撷得更多英华，慰藉心灵，感悟生命。



总统并非皇帝

目录

CONTENTS

总序：民国何在…石钟扬 / 1

导言：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石艳艳 / 1

中华民国成立

直前勇往 / 2

须弃冯袁 / 3

定国安民之刍议 / 3

呜呼前清之资政院议员 / 5

临时政府暂设于金陵 / 6

公与义 / 6

再思临时约法 / 7

悼健儿烈士 / 7

驳严复 / 8

中华民国有总统之第一日 / 8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 8